

# 明清科学口译活动概论

黎难秋 (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,安徽 合肥市 230026)

**摘要** ]文章记述明清时期我国科学口译活动的门类、译员培养及主要培养机构,清末各类涉外翻译官员及其职责。

**关键词** ]科学;口译;明代;清代

**中图分类号** ] H315.99

**文献标识码** ] A

**文章编号** ] 1000-6141(2000)03-0061-04

## 1. 明清口译活动的门类

明清口译活动的门类甚多,现简述如下:

### 1.1. 为外国教师授课担任口译

洋务运动兴起后,中国相继出现了各类近代学校。有培养外语、兵工、矿务、船政等人才的专门学校,也有综合性的高等学校。外国教师在中国学校授课时,若不会讲中国话,便需口译人员帮助翻译传述。因此,当时不少懂得外语的中国人便担任了外国教师授课时的口译人员。

例如,上海方言馆章程就载明该馆聘有通西语西文之委员董事四名,外国教师授课时,四人在堂环坐,从事译传,使学生易于理解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校的外国教师为各船海员及各厂工匠授课时,也有两名口译人员翻译传述。再如,190年后,中国许多新式学校招聘日本教师授课,他们讲课时,绝大多数人也必须由中国口译人员传译。

### 1.2. 翻译书籍时担任口译

明清两代很长时期内,我国翻译书籍资料一直是由口译与笔述人员合作完成的。从明末至19世纪,译书的口译人员几乎全是外国人。至19世纪末,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已涌现出一些译书的中国口译者,如舒高第、严良勋、凤仪、吴宗濂等,后三人是由上海方言馆、同文馆培养的。

### 1.3. 涉外工作领域的口译

大量口译人员在涉外领域工作。明代四夷馆培养1种外语的翻译人员,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外国使节朝贡时的口译工作。雍正、乾隆朝西洋馆与俄罗斯文馆,培养的也是懂得拉丁文与俄文的外交翻译。鸦片战争后,清廷为外交所迫,设立我国第一所

正规的外语学校,开始大量培养涉外领域(外交、外贸、海关等)的翻译人员,他们大量的翻译工作是口译。本报告则主要围绕涉外口译工作,简单介绍明清两代培养翻译人员的学校,这些学校培养的翻译人才以及其他出身的翻译人才。

## 2. 明清两代对邻国语言译员的培养

明初因周边国家纷纷前来朝贡通好,永乐五年(1407年),明廷设立四夷馆,隶属礼部翰林院,选派国子监生蒋礼等38人,学习邻国语言与翻译。四夷馆逐渐发展为传授10种外国语言的学校,聘有缅甸等外国教师,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授以八品衔,得充任翻译官或留馆任教。至正统年间(15世纪40至50年代),馆务发展顺利,以至发生“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,私自习学,滥求进用”的现象。据史料记载,天顺三年(1459年)时有学生154名,正德三年(1508)、嘉靖十六年(1537)、嘉靖四十五年(1566)、万历三十二年(1604)、万历三十五年(1607)、天启五年(1625)、崇祯元年(1628),四夷馆七次招生共594名。此外,又有记录,曾多批招收病故教师之子孙入馆继习译业。明末,朝廷衰微,无暇顾及,10馆师生散失众多,四夷馆几乎已名存实亡。

入清后,清廷改四夷馆为四译馆,但馆则基本全部沿袭。1673年,四译馆又逐渐恢复到10个学馆。

从明四夷馆到清初四译馆,可视为明清专门培养译员的学馆。但明清两代又都沿元制,礼部还设有会同馆负责接待外宾,且兼培养外事翻译官员。乾隆十三年(1748),清廷将四译馆与会同馆合并为会同四译馆。至此,清廷将翻译、外事与培养外事译员的工作由会同四译馆统一执掌。清末,总理各国事务衙

**收稿日期** ] 2000-01-03

**作者简介** ]黎难秋(1938-),男,广东中山人,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原馆长,教授,中国译协理事,主要研究中国科技翻译史。

门与同文馆设立后,会同四夷馆遂于光绪二十九年(1899)被裁撤。

关于四夷馆师生的翻译活动,见于史载的甚少,可从四夷馆翻译和保管的外国文书《华夷译语》略见端倪。《华夷译语》现已散落世界各处,究竟有多少种,包括的语言到底有多少种,现尚无定论。散见的零本不计,已知的多卷本有:日本的1卷本,英国的10卷本与1卷本;德国的24卷钞本;法国的17卷本等。这些卷本包括的外国(外族)文字就有19种。其中19种文字与四夷馆10馆所习文字相同,即:鞞鞞、女真、西番、西天、回回(波斯)、百夷、高昌(回)、缅甸、八百、暹罗。此外又有9种文字,即:日本、琉球、安南、占城、朝鲜、猛卯、湾甸、满喇伽及汉回(土耳其)。据此,可知四夷馆师生的翻译活动涉及19种外语,规模不会很小。明代与有关外国交往时,四夷馆师生及培养的翻译官员,当然会参与相应的口译活动的。上述19种语言,包括波斯与土耳其语,所以实际上涵盖了东亚、南亚、西亚乃至欧洲一些国家的语言。(参见《四译馆则》等)

### 3. 明末清初对西方语言译员的培养

明末耶稣会士入华后,对西方语言首感兴趣的中国人王征,他曾从耶稣会士金尼阁习拉丁字母25个,并在译著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》中使用过,但仅此而已,他并未通晓拉丁语言与文字。(见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》)

崇祯九年(1636),入侵台湾的荷兰人,在台教学生习荷兰文。3年后,从史料可见的就有约600人学习,且已有50名台湾人可充当荷兰文教师。一段时期内,台湾的契约、帐册、函件等已采用荷兰文。其中也应有能操荷兰语的口译者。

清初,中俄边事频仍,交涉日多,清廷唯依靠耶稣会士充当翻译,如张诚、徐日升、巴多明、宋君荣、方守义等,皆以通晓拉丁语与满汉语言充当过翻译。康熙帝为培养中国自己的拉丁语言翻译,有意设拉丁文学堂。雍正七年(1729),清廷始设西洋馆招收满族青年习拉丁语文。巴多明、宋君荣先后主其事。雍正十年(1732),宋君荣在致友信函中已称“学生多能操拉丁语,成绩颇优。”但据耶稣会士钱德明称,西洋馆建馆15年后,学生中仍无任译员者。据方豪考证,四译馆与会同馆合并时,西洋馆也同时并入。方豪又考证,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写本《华夷译语》,凡98卷,收文字已达34种。西洋馆的6种中,拉丁语有5卷,收拉丁词约2000条。每个词条含拉丁文、汉文译义及

汉文译音。(见方豪《中西交通史》)

康熙帝同时致力培养俄语译员,康熙四十七年(1708)设立俄罗斯文馆,先后聘俄国商人瓦西里、俄国战俘库兹马、伊凡及尼堪等为教师。学生人数长期维持在25-27人。学生考试成绩优秀者授予八品官职,并可逐渐迁升至七品、六品。俄罗斯文馆存在154年,于1862年并入同文馆,究竟培养了多少翻译人员尚待考。据查,清内阁大库残存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的俄文档案,就多达19本;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的《筹办夷务始末》中,也收录有俄国外交文件的译文。因此,可以推测,从乾隆至同治,定有中国自己的俄文译员参加翻译活动。但至道光十九年(1839),俄罗斯文馆出身从七品迁升六品的升途变窄,俄罗斯文馆开始衰微,至同治初更已名存实亡。

### 4. 同文馆与译学馆

同治朝之前,我国的所谓外务工作,仅限于接待周边国家使节前来中国“朝贡”而已。真正的外务工作实始于19世纪中叶。先是鸦片战争后,1857年签订中英《江宁条约》,被迫开放广州、上海五市为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设领事馆。随之,美、法、俄、德等国相继在五口设领。1858年,中英《天津条约》又规定,中英可在对方京城互派大使,全权处理两国外务工作。1860年,英、法大使率先驻京。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松焘迟至1871年才派驻英国。迟迟不能派出驻外使节,其中原因之一便是缺乏经过正规培养、兼通外文与外务知识的翻译官员。

1860年,就在英、法两国公使驻华的同时,清廷已在筹划创设我国培养正式翻译官员的外语学校——同文馆。自1862年始,同文馆先后设立英文、法文、俄文、德文及日文各馆,聘任外籍教师达40余名。1862年、1864年,上海相继设立广方言馆与广州同文馆,与京师同文馆共同培养正规的外事翻译人员。同文馆39年间培养学生的准确数字尚未见。但据资料载有名姓可查者就达508名。自1866年始,已有优秀学生开始参加外事翻译实践。据可统计者,同文馆学生出校后担任外交、驻外、商务、税务、铁路、洋行等领域与翻译有关者达147人。由外事翻译官员逐渐升迁至驻外公使者有16人,升迁至驻外领事者13人。(见《同文馆题名录》等)

1901年,同文馆奉旨归并新建的京师大学堂,初改为翻译科。1903年,清廷设立译学馆,翻译科遂又并入。故译学馆可视为同文馆之继续。自1903年至1911年结束,译学馆前后凡九年。其间有监督六任。

历年共聘教职员 122 名,其中中国教员 103 名。中国人任外语教员者 23 名,其中 7 人出身同文馆。译学馆招收 5 届学生共 700 余人,实际毕业生凡 347 人。毕业生后在外交、翻译、外贸等领域工作者共计有 48 人。

### 5. 清末翻译与外务人才

同文馆成立前,我国沿海地区一些居民,因信教、经商等种种原因,与洋人多有接触。其中有的人学得一些日用外语甚至外文,已能在中外贸易或中外交涉活动中担任口译工作。他们有的受雇于各种洋人机构,有的则为朝廷所雇佣。

见诸史料较早的这类口译者之一为明末阉人亚三。明正德年间(1506-1521)一些史料载,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拟强入中国内地贸易,雇通番语的亚三为翻译。亚三甘愿沦为汉奸通译,贿赂贪官,收集情报,使葡人得以深入内地。后亚三因骄纵而遭伏诛。

明末清初有中国天主教徒学习西语,甚至出国留学,但他们学习目的多为宗教,少有涉足外务翻译者。

乾隆、嘉庆年间,嘉应人谢庆高(1765年生),年轻时随商贾赴海南。途中遇海难为洋船所救,遂随游各国,滞留国外 14 年。1797 年,双目已失明的谢氏回国后流寓澳门,依靠担任通译糊口。他大概是清中期担任口译且有文字记载的少数人员之一。他还留有《海录》一书,记游西南洋各国事。(见谢清高《海录》)

在容闳留学学成回国任口译工作前,有一位值得追忆的口译人员,他就是林霏(1824年生),林氏闽县(现福州)人,幼居厦门,早早学会了英国语文,并能依靠为洋商担任翻译谋生。184 年,他作为一个年仅 2 岁的青年人,因“素习番语,译文为各国所推崇,奉委经理通商事务”,受聘赴美国担任商贸翻译人员。这是有文字可考的我国早期受聘于国外的一位口译人员。林氏在英国工作一年多,回国后撰有《西海记游草》,刊行于 1849 年。书前有左宗棠、徐继畲等人的题记。可见左、徐对外务口译人员并不轻视。林氏既熟英语,又谙通商事物。从《西海记游草》自序,可知他还读过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的科学译著,不仅具有正确的地球、地理、天文仪器等科学知识,对于电报、轮船、照相机等先进技术,也描述得十分确切传神,并且有志于“舟车之学”。在 19 世纪 40 年代,林氏实属一位难得的人才。在美国工作时,他为营救 26 名受骗华人,能出庭“代译始末情由”,“将文凭当堂译明”。可见他还熟悉涉外法律事务,胜任对外交涉事务,与当时一些勾结洋人以营私利的中国口译者

完全不同,他又是一位爱国的具有正义感的民间口译人员。

同时期略可记述的民间口译人员是罗森。罗森的生平未详,仅知他是广东人,生活在广州、香港一带,交接有外国传教士卫三畏、马理逊、麦都思等,从而学会了英语。1851 年,美国率领舰队赴日,意图逼迫日本与之签定通商条约。舰队自香港起航,司令员邀卫三畏为翻译官。罗森受卫三畏等人之邀,同随舰队赴日参与翻译工作。回国后,他留下了一本《日本日记》,曾于 1854-1855 年连载于港刊《遐迩贯珍》。《日记》记有日本人明氏问罗森语:“子乃中国之士,何归<sub>三</sub>舌之门?孟子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非<sub>三</sub>?”可见他应邀赴日确实担任助译工作。但从《日记》可知,他汉学基础较差,科学知识也远不及林霏,至多是一名粗通文墨的下层知识分子,更近于是一名商人。

同文馆前最负盛名的口译人员当推容闳。容闳(1828-1912),广东香山(现中山)人,7 岁入澳门洋人所办学校,后转入马理逊学校。184 年,得美国教师 Samuel Robbins Brown 的帮助,与黄胜、黄宽同赴美国留学。1854 年,成为我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。容闳终生志愿在于呼吁清廷派遣中国幼童赴欧美留学,以推动“西学东渐”的宏大事业。但他在回国之初,为了生计曾担任过一系列的翻译职务。在回国船近香港时,有中国领港人上船,外国船主便请他代为翻译。翌年,他进入香港高等审判厅任法庭翻译,因不断受英国籍律师排挤,旋愤而辞职。1856 年,容闳赴沪,不久又于海关翻译处谋职。当发现“中国船上商人与海关中通事,咸通气,狼狈为奸,以图中饱”,他“深恶其卑鄙,不屑为伍”;加之,海关总税司歧视中国译员,不予与洋人同享升迁之权利,容闳再度辞去翻译工作。1865 年,容闳受命赴美为清廷购买江南制造局所需机器。回国后,曾国藩专折请奖,称容闳“不仅通译之才”,请朝廷特授以候补同知衔。由于国内高度缺乏优秀的翻译,容闳以候补同知的资格,在江苏省行政署仍任译员。1870 年,天津发生教案,清廷派曾国藩等四大臣前往调停。因缺乏称职之译员,再次电招容闳赴津助译。这是容闳真正第一次出任中国政府外事活动中的翻译官员。四大臣因他翻译有功,遂帮助他获得清廷之批准,督领中国第三批幼童留学美国,开始了他多年执着追求的真正事业。人们评价容闳,主要着眼于他在中国人留学史方面的业绩,却忽略了他在在中国口译史上应

有的地位。(见《西学东渐》)

与容闳同赴美国留学的黄胜,次年虽因病回国,但后来曾在传教士理雅谷翻译中国经典著作时,给予他很大帮助。1873年,他随我国第二批赴美留学幼童再次赴美。1878年,黄胜入我国驻美使馆,成了一名真正的翻译官员。

同文馆出身从事翻译及相关涉外工作可考者有147人。他们从翻译官员做起,逐渐升迁至与翻译相关的驻外公使或领事。他们中有:张德彝(1847-1918),1901年出使英、意、比大臣,还当过光绪皇帝的英语教师;汪凤藻(1851-1918),历任驻俄使馆参赞,189年任我国出使日本大臣;吴宗濂(1855-?),190年起任驻西、奥等使馆代办,后升任清廷外部右丞,出使意大利大臣,民国时期任过大总统府外交咨议;等等。

#### 6. 外交翻译官员的主要职责

清末外交翻译官员的主要职责甚多,现仅举见诸史料的8项于后:

—— 随同出使各国大臣觐见国主,呈递国书。如1890年,翻译陈季同、吴宗濂与世增随薛福成向法国皇帝呈递国书,并以法语译传颂词;又如,1878年,嵩厚使俄,1896年李鸿章历访欧美;1905年五大臣考察欧美日各国,在向各国元首呈递国书时均有翻译官员随同。

—— 参与外交谈判与签约。参与外交谈判及签定中外条约,是翻译官的重要职责之一,史料所载例子甚多。例如,1880年曾纪泽与俄商谈修改不平等条约,历半载数十次的辩论与谈判,自始至终均有翻译官参与翻译,中国翻译官有庆常、桂荣与穆庵三人。

—— 官员外访考察时从事译述与译谈。清末外访的官员绝大多数不通外语,故必有翻译官员随同。

以五大臣考察团为例,1906年载泽访英,会晤英内务大臣、外交大臣、警察总局局长、海军部部长,在其《考察政治日记》中均记述有翻译官员在场传译。

—— 在外听课与研讨时任翻译。使团出洋考察,有时请外国官员或专家作专题讲课或研讨,如载泽考察日本时,日法学博士为我使团专门讲述日本宪法,时随团翻译官唐宝锷与钱承志担任口译并记录。考察英国时,英国各部均安排专家讲演介绍,出访大臣并随时与专家进行“译问”、“译谈”,翻译官员都在场译传。可见,清末一些翻译官员已具备各种专业知识基础,逐渐成熟起来。

—— 参加各国议会、朝会与宴会时即席翻译。在这些场合,主宾双方时致颂词、赞词,翻译官员不仅要为出使大臣及时传译,有时还需临场应变,为大臣排忧解难。1896年,李鸿章访英时,许多场合均依赖翻译官员罗丰录。罗氏以其优美的语句及对西学的博识,深得外国人士的好评,英国《特报》刊载专评,赞誉罗氏杰出的翻译才干。

—— 临时调任其他外交任务。例如,担任钦差大臣的翻译、参赞;短期执行签约、修约、庆贺等外交任务以及实施特殊考察等。载泽使团翻译中,刘彭年、唐宝锷均受派留驻日本考察并编译资料;高尔谦、魏子京则留欧继续考察,均不再随团。

—— 编译外国书报资料。翻译官员均有一项使命,即随时编译驻在国的书报资料并整理成册,以呈缴朝廷施政时参考。在曾纪泽、薛福成、郭嵩焘等出使大臣的日记中,都有许多这方面的记录。

—— 在外国进一步进修外语及有关知识。如张德彝随志刚、孙家谷出使任翻译见习官时,曾在伦敦进修英语。庆霭堂任驻法使馆翻译时则进修法语与地理等知识。

## A Brief Review on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

LI Nan-qiu

(Library, University of Sci & Tech of China, Hefei 230026, China)

[Abstract] Article describes various kinds of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activities, training of interpreters and training schools,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preters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their duties.

[Key words] science; interpretation; Ming dynasty; Qing dynasty